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基金丛书
学 术 著 作 系 列

民族危机下的 教育应对

余子侠 著
C B J J

出版社

华中师范大学



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

余子侠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武汉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余子侠 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

ISBN 7-5622-2332-7/G·1178

I. 民…

II. 余…

III. 教育-中日关系-现代-史料

IV. G5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0025 号

民族危机下的教育应对

© 余子侠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桂子山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黄利红

责任校对:罗少琳

封面设计:新视点

督 印:朱 虹

开本:850×1168 1/32

版次:2001年5月第1版

印数:1-1000

印张:9.875 字数:265千字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16.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中日教育交流的历史轨迹·····	(1)
一、	古代教育交流的历史回眸·····	(1)
二、	近代教育交往的历史概观·····	(12)
第二章	甲午战后对日教育的鉴收·····	(37)
一、	教育思想观念的更新·····	(37)
二、	新型学校制度的创建·····	(42)
三、	新式教育人才的养成·····	(47)
四、	新式教育内容的变更·····	(53)
第三章	抗战之前教育领域的排日反日·····	(63)
一、	近代中日教育交往的反常因素·····	(63)
二、	五四以前对日教育的抵制行为·····	(87)
三、	五四至抗战间教育的反日斗争·····	(111)
第四章	战时国民政府教育的应对与发展·····	(152)
一、	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的空前浩劫·····	(152)
二、	国民政府抗日教育的政策措施·····	(161)
三、	各级教育事业全面应变与发展·····	(173)
四、	高等院校移迁发展与抗敌御侮·····	(186)
五、	留学教育变异与留学界抗日救国·····	(228)
第五章	革命根据地教育变迁发展与抗敌斗争·····	(249)
一、	中国共产党抗日教育方针政策·····	(249)

二、革命根据地战时教育管理制度	(256)
三、革命根据地各级各类教育发展	(261)
四、革命根据地反奴化教育的斗争	(277)
第六章 近代日本侵华殖民奴化教育的历史终结	(289)
一、接收敌伪教育的政策与措施	(289)
二、接收和甄审工作的全面展开	(293)
三、战时留日学生的召归与甄审	(300)
后记	(310)

第一章 中日教育交流的历史轨迹

历史是一条长河，在源远流长的中日教育发展和交往关系史上，既有阔直流畅的河段，也有曲折回旋的流程。而这种中日教育关系史上的变易状况，又往往与各个历史时期国际形势的转化变迁和中日两国文化教育的发展变异存在着密切相关的内在联系。一旦中日文化教育的水准位势有所转换，交流形式发生变化，两大民族对这种教育领域内的交换内容和交往途径，必然形成不同于既往的处理态度和行为方式。尤其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由于中日之间国际地位的变易，两国的教育交往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向易位的变化。

一 古代教育交流的历史回眸

一衣带水的邻邦关系，中日两国之间的社会交往和文教交流，其历史甚为悠久。在这两大民族数千年的关系史上，教育交流是其中重要的领域之一。

日本正式立国，除去神话传说时代，据其史书所载，应始于公元前 660 年左右。其时的“日本”，正如日本的《古语拾遗》开篇所言：“盖闻未有文字。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即使在这种毫无后世所言的“文化教育”的时代，中华民族的文明也在对其发生着最原初形态的影响。这就是通过最初的“渡来人”将东亚大陆的农业知识技能输入日本的先民社会中，伴随着农业知识技能——“稻作”技术的输往，中国古代渡海东去的“渡来人”亦将陶器、铁器等制作和使用的技能楔入正向文明社会起步的日本原初文化。于是有如河源滥觞，中日开始了古老的社会和文化交往。

及至秦汉时期，经过既往数百年的发展，日本渐为中国所知，于是有如河流初成，两大民族之间的交往或接触，开始有了可见痕迹的“流动”了。人们熟知的秦始皇时期徐福“入海求仙”的历史事迹，正是中日直接交往初期行动的表现形式。公元1世纪时，在今日的日本国土上已有上百个称作“倭”的部族国家。《山海经》有“南倭北倭属燕”之说，是为中国人知有日本见于文字记载之起始，亦为中国以“倭”称呼日本之初声。与之同时，中国的文字——汉字，据有关研究者考证，也开始在这一时期为日本人所接触。随着秦汉尤其汉帝国的国力日益强大和文化辐射日益加强，中国为东亚大陆文化宗邦的国际地位日渐确立，并且使包括日本在内的四邻诸国受到强烈的影响。于是有了《后汉书》所记载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译〕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安帝永初元年（公元107年），倭国王帅升等献生口百六十人，愿请见。”^①由此可知至迟在东汉时期，中日两国已建立了邦交关系，自此贡使时有来往。教育交流亦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开始产生出真正的历史行动。

中日之间教育交流的历史行动，今天于史书记载有文字可查者，发生在魏晋时期。据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早在晋太康年间即日本应神帝统治初期，其时朝鲜半岛上的百济国汉学家阿直岐前往日本，应应神帝之聘而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之师并教其以儒学经典。不久，阿直岐又向应神帝推荐了“邦之秀”者王仁。于是王仁于晋太康六年（公元285年）携带儒家著述《论语》以及《千字文》等书^②，渡海东往并被征为博士，成为日本皇室重

① 《后汉书·东夷传》。

② 此《千字文》非指后来南朝时期梁朝周兴嗣所撰的蒙学书，而是魏晋时期书法家钟繇所撰之书。据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所考，王仁赴日，“始赍《论语》十卷，《千文》一卷”。“考李邕《千文注》曰：钟繇始作《千文》，此盖钟氏《千文》也。”又于《日本杂事诗（广注）》“汉籍”诗注中曰：“考李邕《千文注》云：钟繇始作千文献晋武帝。应神当武帝时，殆钟氏《千字文》也。”

用的汉学教师。自是开启了日本宫廷教育之源。随着教育对象逐渐由皇太子而扩及皇族和宫廷其他贵族的子弟，日本学校教育的最初形态——学问所开始形成，相与而成的是，中国的儒学经典也就开始成为日本官方尤其宫廷教育的重要内容了。有此良好的开端，由于其时中华文化处于世界文明水平的高位势，故至南北朝时期，日本为了改变自己文化发展的后进地位，中日之间教育交流的行为在日本民间社会中也开始有了积极的反应，并由此逐渐形成隋唐时期中日教育交流的高潮。

了解中日教育交流走向历史上第一次高潮的历史成因，下述两种历史现象值得人们注意：一是公元5世纪—6世纪时，大批的大陆移民通过迁徙日本而成为日本社会中的“归化人”。这种因躲避战乱而流亡日本的大陆移民，在日本钦明帝元年（公元540年）编制“归化人”户籍时，已达“七千五十三户”。他们大多能写会算，通晓先进的科技知识，掌握各种手工技艺，其中更有一些称作“医、易、历、五经博士^①”的学者，尤为日本大和朝廷所礼重。于是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华文化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衍。一是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化的佛教文化逐渐在日本社会中“安家落户”。南朝梁元帝承圣元年（公元552年），日本即得佛像于百济并开始建立起日本的第一所佛寺。至南朝陈后主时期，日本社会中佛教的男女信徒已开始有人落发为僧尼。于是，中国式的佛教寺院教育也开始在日本社会中产生着日渐深远的影响。有了如此种种历史基础，当时代转入隋唐时期，中日之间的教育交流，随着两大民族的社会和文化交往日渐频繁，很快即进入了历史的最佳境地。

隋唐时期，中日两国之间的教育交流，虽说仍然呈现自中而日单向性输往的状态，但作为教育交流的收受方日本，在学习和借鉴

^① 据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所叙，“继体七年（513年），百济又遣五经博士段杨尔；十年（516年），复遣汉（高）安茂；于是始传五经”。又《日本杂事诗（广注）》“汉籍”诗注曰：“《日本纪》以《礼》、《乐》、《书》、《论语》、《孝经》为五经。”

的过程中比较既往来说却主动和积极得多。其中在历史上意义最为重大和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莫过于日本先后向隋、唐王朝派遣的遣隋使和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①。

隋唐时期，自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日本推古天皇阿每多利思北孤“遣使诣阙”，到唐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日本来唐使节参议管原道真请求中止“聘使渡海”行动获准为止，在近300年的中日交流中，日本共派遣来华使团计达十六次之多，其中遣隋使四批，遣唐使十二批^②。在这些来华的使团中，日本方面极其重视他们的人选，尤其那些领导层的人物，均以才德为重，兼顾举止仪表，要求他们必须是爱好学问、潜心研究的硕学俊彦，以便在短暂的旅华期间学到更多的中华学术、制度、礼仪、技艺等，提高学识，开阔眼界，以期归国能作大用。故而这些遣华人物的主要使命，在于文化交流，如隋大业二年（公元607年），日本推古天皇“冀闻大国维新之化”派出以大礼小野妹子为大使的第二批遣隋使团，来华后即登衡山访求佛法。又如唐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日本来华使节即“请谒孔子庙堂，礼拜寺观”，得到了睿宗皇帝的恩准。再如唐开元初年（公元717年），日本使者来朝“请儒士授经”，玄宗皇帝即指使四门学助教前往使者下榻之所“传授儒经”。至于以藤原清河为首于唐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来华的遣唐使，更是获得玄宗皇帝的特允，纵览经、史、子、集四库存书八万九千卷，并参观浏览了唐中央内存九经三史的三教殿。所有这些以派遣使节的形式进行的交往活动，均对日本的文化教育产生着重大的积极作用，而且这些来华使团，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大多为日本社会的精英人物，故而归国之后对于本国教育事业的进步均能作

① 据《续日本后记》等书，其时来华的留学生又可分为学问生和请益生，留学僧亦可分为学问僧和请益僧。学问生和学问僧，乃志在深造的长期留学之人；请益生和请益僧，则在来华前已在某些领域有所研究和造诣，来华后只是带着一定的问题进行研修。

② 此外还有3次“送唐客使”和1次“迎大唐大使”的外交行动或遣唐行为。

出相当的贡献，甚至那些随从人员，亦能对日本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如在天宝年间来华的日本使团中有膳大邱者，随使游唐王朝的国子监，见门题“文宣王庙”，即问其因，当从中国学子口中得知此乃唐皇追尊先圣而用王号之，归国后即奏请日皇亦以此尊孔，于是日本亦于公元760年左右（约在唐肃宗上元年间）追尊孔子为“文宣王”，自是日本尊孔重教一若中国。

当然，就中日教育交流并对日本教育产生深远影响来看，隋唐时期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的来华求学，其历史意义更为重大。早在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第二次遣隋使来华时，即开始了日本正式派遣留学生的活动。到了唐代，日本来华的留学教育更为兴盛。自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日皇廷采纳由唐归国的留学生和学问僧惠济、惠光等人建议与唐修好，并于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派出第一次遣唐使而后，日本来唐留学者相望于道。计连隋时来华留学者，日本在隋唐时期共派遣了16批留学生和留学僧，除此而外，尚有一批批的医师、药师、画师及各种艺师、工匠等人众，前来中国接受为时久暂不一、学科类别各异的教育，全面地学习中国的儒学、佛学、哲学、文学、医药学、天算学、音乐、舞蹈、绘画、书法、建筑、手工业技术和政治法律制度等。如众所知，中国在隋唐尤其盛唐时期，已形成了各种完备的典章制度和高度发展的学术思想，即如在学校教育方面，中国封建时代的学校制度和官学管理体制于其时已是日臻完备。各级各类学校的产生和发展，学校教育的分级分类管理以及学校管理的学业考试程序化等，使其时的教育事业也呈现一派“盛唐气象”。适值其时，数以百计的日本学子来华求学，而且一般在中国留居的时日都较长，甚至有居住长达三十余年者，加之他们明确的求学目的和勤奋的为学态度，所以对中国文化教育的理解相当全面和透彻，对中国学校教育从制度到精神的认识也相当全面和精深。由是归国以后，他们不仅对中华上邦文化制度盛事鼓吹，而且一如中华所为，逐渐地建立起自己的学校教育制度。是故后世的日本学者一直将这一时期中日的

教育交流，作为“日本学校教育的历史源头”^①。

日本的中国式学校教育制度，始建于“大化革新”之后。唐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日本国内以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为首的革新派拥立孝德天皇即位，建立以“大化”^②为年号的新政权。翌年即颁发诏令，定官制，革弊政，接受汉学，制定仪礼，借取中华制度，实行全面改革。在支持和参与革新的人物中，不少人即为中华文化的崇拜者和儒学在日本的传播者。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如中臣镰足、中大兄皇子等即向有关留华归国的人物学习过儒学，而被大化朝廷任命为管理教育的“国博士”高向玄理和僧旻等人，则更是在中国留学多年的重要人物。这些人早在“大化革新”前后就积极致力于私学教育的发展，为日本的中国化学校教育的产生打下一定的基础。及至唐咸亨二年（公元671年）中大兄皇子即位为天智天皇之后，即正式开办官立学校，并委任精通汉文化的百济归化人鬼室集思为“学识头”（即学校校长）。唐武后大足元年（公元701年），日本又仿照唐朝的法律制度订定了《大宝律令》，其中涉及学校教育的条文颇多，尤其在“学令”中，明确地用法律的形式使日本学校教育走向正规化和制度化，规定在京城所在地设立大学寮、地方（“国”）政府所在地设立“国学”，自是而后，日本的学校教育制度一如中国，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级。与之相应，为了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和加强学校教育的管理，日本还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起自己的考选制度。总之，包括教育在内的日本文物制度，均于其时因学习中国而相继创立。正如有关日本史学研究者所指出，“日本中古制度……有好多完全是模仿唐制的”^③。

为了使人们更加明晰其时中日教育交流及日本学校教育兴起的历史实际，不妨看看在唐留学近20年的吉备真备归国后的有关事

① 如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的《唐代教育史研究》即以“日本学校教育的源流”为其副标题。

② 此为日本国有年号之始。

③ [日] 木宫泰彦：《日本文化交流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63页。

迹。唐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作为留学生人选的吉备真备和作为留学僧人选的阿部仲麻吕（即中国人熟知的晁衡）一道，随同日本国第九次遣唐使团来华。在华期间，吉备从诸儒读经，受教于四门学助教赵元默，精修过三史、五经、名刑、天算、汉音、书法等诸多学问，对中华文化学术颇为精通。归国之际，他又以自己所得的赏赐全部购书而归^①。其时日本，自大化革新定儒学为治国大纲以降，学校教育颇有进步。在官立的中央大学（大学寮）中，以经史为主要教学内容来造就官僚队伍的后备军。吉备归国后即在大学寮执鞭，向400多名学生传授自己在唐研习的知识和学问。不仅如此，他于日本学校教育乃至整个日本文化的进步，值得一提者尚有下述数点：一是他以《史记》、《汉书》、《后汉书》为教学科目，为后来《大宝律令》中有关学制改革由以往的经学本位扩展到纪、传、道三科并立打下了基础；二是他选取汉字偏旁制定出片假名，与留唐归国的学问僧空海创造的平假名一起，使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三是他鉴于当时的译员口语翻译能力的低下，积极促进大学寮音道的发展；四是他携归的《乐书要录》和铜律管等，对日本音乐艺术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也有不少的促进。他如日本国史的编撰、日本礼典的修订、日本对中国历书的采用等等，吉备氏亦多有贡献。正因如此种种，故而唐天宝九年（公元750年）当日本再度派遣使团来华时，时为从四位上的吉备还被拜为副使，率领又一批年轻学子来华取经。故在探讨中日文化教育交流史时，人们在极力褒赞阿部仲麻吕、鉴真等人时，也应该记住“此人在日本文化上，功亦甚伟”^②。

综合言之，隋唐时期日本向中国学习和取鉴，比较过去主要是经过朝鲜半岛间接吸收而言，不仅转易为积极主动地直接吸收和引进中华文化，而且持续性地派遣知识人才来华耳濡目染，加之作为

① 计吉备真备购置带归日本献诸朝廷之物，有《唐礼》130卷，《大衍历经》1卷，《乐书要录》10卷，测影铁尺一枝，以及定音用的铜律管一副等。

② 王芸生：《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第1卷，大公报出版社1932年版（上海书店影印本），第10页。

友好交往的回应，隋唐王朝亦相应地派出遣日使团计达十余次，积极推行友好的睦邻政策，是故此际中日的教育交流，对于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确立和发展，起着催生和奠基的作用：在教育组织形式上，日本亦如中华学制，分中央和地方两级设学；在创办学校类型上，日本的学校教育也包括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学校教育管理上，日本于教育行政亦分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于学校内部也如唐朝各级官学而明确规定了考试和假日；在学校教育内容中，日本主要的教材还是儒家的经典；在学校教育对象上，各级官学中同样存在等级身份的区别，女子同样无权接受学校的教育……如此等等，无不表明其时中国对日本教育影响之深以及日本对中国教育师法之诚。自是而后，日本才有了随之而来的上千年的教育进步。

隋唐时期中日交流的高潮过后，中日两国文教事业的直接交往虽说随着唐乾宁元年后遣唐使的中止而大为受阻，但通过其他种种渠道依然保持着一溪涓流。检阅史籍，自五代至清朝中叶长达近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中日之间的文教交流仍颇有进步之处。如在五代，依然有高僧来华切磋学问，中国的割据王朝如后唐、吴越等亦有使节前往日本，故其时日人受中华文化的启迪仍多。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是，中国自唐末到宋朝初期，官学大为衰败，学校教育重任主要由私学及后起的书院来承担，而日本亦自延嘉年间（公元901年—922年）起始，官学逐步衰落，在随后的近四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中，学校教育的阵地亦主要表现为私学。两宋时期，中日贸易频繁，仅在北宋时期，中国开赴日本的商船即不下六七十次，同时驶往宋朝的日船亦日渐增多。而日本在这个历史时期中来华求学的人物，则以求法取经的学问僧为其主力军了。同时中国也有一些禅林学者（禅僧）前往日本。于是，正在形成中的“宋学”以及中国佛教的禅宗（包括临济宗、曹洞宗）等，正是经由其时中日民间交往的诸般人物的播衍而炽蔓日本全国。有元一代，中国亦曾遣使问贡于日本。尽管其时中日关系恶化，但民间交往却不绝如缕，据不完全统计，仅日本来华的僧人有名姓可查者，就有220多人。他们不仅深究佛理弘扬佛法，更将中国的诗文、儒学、史学、书法、

绘画、茶道等知识和技术带归日本，并使之在本国内广泛传播。明清时期，中日之间文教交流再度出现一股热潮。就其对教育进步作用重大者而言，诸如活字印刷术的传入，为日本学校教育的扩展摆脱了书籍贫缺的窘态；迥异于隋唐数学的元明数学以及珠算和算书的引进，为日本后来“和算”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宋明理学尤其朱子学的输往，为日本的学校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思想注入了新的养分；他如宋、元、明、清时期发展和创新的中国医药、天文、历法、农政、冶铸、织染等等知识和技能的传入，无一不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日本的学校教育内容和促进各类学科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即如在教育主旨和学校制度方面，尽管自五代以降再未出现过隋唐时期那种“全盘化”的现象，但亦有不少借鉴模仿：受宋代以来中国教育思想界重视忠孝礼仪的封建意识的灌输，日本的武士教育亦重视忠孝的提倡；受宋代以来中国书院教育组织形式的启示和藏书风气的感化，日本在镰仓至室町时代亦有寺院教育的发展和重视藏书的教育机构的建立；元代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曾重视医学和阴阳学的发展，日本亦在德川幕府统一之前的一个历史时期内重视阴阳师的设置；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为了加强地方社会教化和发展基层教育而创兴社学，日本亦有为淳化社会风尚而创立的重视道德教育的乡学；至于明清时期教育领域的朱氏理学与王氏心学之争，则更直接影响着日本江户时代儒学内部各派的形成发展和相互争胜^①……这种文化教育传输的活动轨迹，即使到了明治维新时期

① 作为中日之间教育交流极有影响的历史人物，于宋明以来的中华学术在日本传播有重大贡献者，中国学者朱舜水与日本高僧了庵桂栖尤其值得一提：前者自公元1659年渡海东行，直到1682年离开人世，在日20余年间，不仅自身广收门徒，传播中华文化，影响几及日本全国，而且劝谕水户藩侯创建学宫，“规模一如中土”，以致“诸藩并起而效之”，故于近代日本，实开其“文教之先声”（参见王韬：《扶桑游记》，见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后者于公元1503年作为遣明使前来中国，至1513年才返归本土。在明10年间，他潜心研究儒学，并与“心学”代表人物王阳明交往密切。在其归国之际，王守仁还撰文相赠。后来日本学者中江藤树开创日本的阳明学派，其起端应追至了庵的中国之行。

也能清晰可见，其时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还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日本发生着影响。据有关学者研究，直到明治初年，虽说其时日本社会中就学率男子已达42%，女子为10%，但其时的学校教育，遑论一般的私学或私塾，即使那些从中央到地方由政府设置或支持的学校所传授的知识，也“主要是讲授正统的中国传统学问，即以儒学为中心的朱子学”^①。

明清以降中日之间的教育交流，更值得人们注意和具有更大历史意义的事情，自然是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洋文化经过中国知识阶层的吸收、掺合和滤化，再以“汉译书籍”的方式或途径转而输往日本，与日本自身通过耶稣会的传教活动而直接获取的西学知识混而为一，从而构成日本的“南蛮学”——后来江户时代的“兰学”正是依此而发荣繁盛。先是在16世纪—17世纪时，以葡萄牙和西班牙人为主的基督教耶稣会士前往日本传教，带去了日本人们所谓的“南蛮科学”。随之西方传教士前来中国，亦将西方有关学术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一些官员士子一道开始编译西方科技著述。由于日本自古以来直接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而且汉文又是当时日本学术界通行的国际文字，所以这些由海道而来的书籍就与其他汉学著作一道在日本知识界流传。到了江户时代（公元1603年—1868年），尤其进入“锁国时期”^②，这种由中国大陆传去的汉译西书，就成了日本人了解西方的一条重要的渠道。据有关学者研究，在“锁国”时期，清朝的商船常常将数量很大的中国书籍带往日本，往往一艘船上就有上百部甚至几百部之多，内容也很广泛，其中也有一些西方传教士编译的汉译西书。如利玛窦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乾坤体义》、《圜容较义》、《经天盖》等书，无不从中国传往，“为日本人所热心阅读”；他如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以

① [日] 冢原修一：《日本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形成》，《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8）·科技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② 日本“锁国”在公元1639年—1853年，计214年处于锁国体制之下。

及《历算全书》、《数理精蕴》等汉译西书，亦“相继输入”日本^①。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之后，这种汉文译书仍然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日本读书人的案头，诸如其时上海墨海书馆、美华书房以及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等处中西学者合译的书籍，即是日本学界的抢手货。据近代日本学者吉野作造的追述，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知识分子还在迫切地期待着这些书籍的输往，“不仅中国新出版的书籍被立即带回日本，即使尚未出版的，也时常传述消息，使日本学者急切盼待”^②。有了这些书籍作垫底，不仅使日本于18世纪通过翻译荷兰文书籍而形成的“兰学”有了生发的根基，而“兰学”的形成与发展又是日本文化教育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而且为后来明治维新时期文化教育的变革和进步，也准备好了一定的文化土壤和历史前提。正如当年通过朝鲜半岛这座“桥”来接收中华文明学习中华文化一样，此时日本又通过中国这座“桥”来吸收西学新知并借以变革自身的文化教育了。对于这种历史发展的走向，人们早就有所说明：“洋学（这里主要指“兰学”——引者注）的传播对日本文化教育的发展变化影响极大。它不仅丰富了教育的内容，而且促使幕府设立洋学研究机构，民间相继开办兰学塾传授洋学。在这个基础上，洋学的内容更进一步扩展到英国学、法国学、德国学等各个领域，为明治维新后移植西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等打下了基础。”^③而鸦片战争后中国人编写的一批介绍和研究世界历史、地理及其社会现状的著述，诸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圣武记》、陈逢衡的《英吉利纪略》、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在日本得到翻刻和传播，无疑又是推动日本社会跨入明治维新的历史进程的思想动力之一。

① [日] 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5页。

② [日] 吉野作造：《日本近代史上政治意识的产生》，载《政治学研究》第2卷第48页。

③ 王桂编著：《日本教育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82~84页。

总体而言，在近代社会以前，中日之间的教育交流，由于其时中华文化的位势高于日本文化，故其主要趋势是日本积极地从中国借鉴和吸收于己有用的教育成分。这种状况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实行教育改革之后才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当日本教育由过去的中国化转而西洋化再进而日本化且进入稳定时期之后^①，中日之间教育交流的情景就完全改变了历史既有的模样。

二 近代教育交往的历史概观

1868年，日本明治政府成立。紧接着自1869年开始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其中在教育方面，取消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建立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到1872年（明治五年）正式颁布《学制令》，创建新型学制，全面展开教育改革，日本的教育正式跨上了早期现代化的行程。经过近20年的试验、反复和发展，到1890年基本上完成了教育的日本化，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由于教育改革的成功和进步，使日本的资产阶级政体的建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经济、科技、文教乃至军事等等方面的人才得到了根本的保障，于是从1878年到1900年间，“日本开始起飞”，一跃而为东方强国，驷马驾乎东方各国之上。随着国力的日渐加强，而文化教育亦开始向海外“扩张”——成为东方世界一些国家效法或借鉴的榜样。更为重要的是，国力的增强也日益刺激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侵略的野心不断膨胀，在“富国强兵”和“东亚共荣”的口号下，开始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化教育的输出。于是，建立在近两千年邦交关系基础上的中日教育交流，也随之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

客观而论，明治维新以前中日两国的文化教育交往，并非完全

^① 据有关日本学者的研究，“日本的教育从1872年开始西洋化，到1890年由于基本上完成了日本化，才进入稳定时期”（〔日〕永井道雄：《近代化与教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